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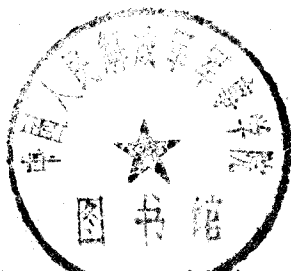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61,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0,000册

书号11310·25 定价1.4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文 献

- 关于“三勤”政策 周恩来 (1)
附：“三勤”政策是党在国统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
..... 吴瑞章 黎 勤 (4)
-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
的偏向 林伯渠 (16)
- 陈毅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在盐阜区
各界座谈会上的演说 (52)
附：盐阜区士绅座谈会工作经验 (78)

回 忆 录

- 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唐
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情况 姚依林 (85)
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 胡愈之 (97)

一次重要罢工的回顾	周 林 (143)
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小林青 (151)

人 物 介 绍

李维汉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贡献

.....	王刚 李青 余鉴则 (164)
-------	-----------------

专 题 资 料

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 组织发展概况

.....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81)
-------	-----------------------

抗战时期党在赣南“工合”中的活动和作用

.....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8)
-------	-----------------------

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

.....	杨圣清 谭宗级 (211)
-------	---------------

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

.....	金字钟 常好礼 (226)
-------	---------------

关于“三勤”政策*

周 恩 来

“三勤”政策即勤业、勤学、勤交友。

问题一，形势决定策略。“三勤”系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种情况下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其主要根据系决定于当时（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的蒋管区政治形势，即新四军事变^①后蒋管区由于消极抗战、积极反动出现民主低潮。因此，这一地区的政治形势既不能与抗日民主高潮的解放区类比，也不能与抗日运动並未消沉的敌伪统治区上海类比。因此，这一低潮时期也不能与后一时期——民主高潮时期（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形势相比。形势既不同，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当然不同。

问题二，历史发展的需要。蒋管区的党经过武汉时期的路线错误，全部暴露无遗。经过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的疏散、撤退和隐蔽都还未奏效，而皖南事变又起，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具体指示是尽量疏散和不要动作与割断关系。我们在当时情

* 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与廖志高、于江震、杨超三同志谈话的一份提纲手稿，发表时作了个别文字订证。

① 即皖南事变。

况下，力求实现这一指示，还能起某些积极作用；故乃于职业化一项以外，加上学习、交朋友两项；经中央批准定为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故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当时采此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且在指示时，说到甚至不作声息也是需要的，等待两三年形势就会变的，到那时斗争来潮一到，就可起积蓄力量的作用。交朋友就是如此，这也是对的。

问题三，执行过程的证明。执行此策略方针的历史过程，也证明其成功：一、如承认当时的组织形式不同于上海的组织形式是对的，那何以这种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不同于上海就不对呢？二、办事处直接领导的各组也执行了“三勤”政策，已显然在推动和领导抗战后期民主高潮上起了很大作用，可见不是“三勤”政策之过，而是某些地方（如马子卿、王、李）执行不力的错误，甚至是执行错了的缘故。三、同样由南方局领导而且也执行“三勤”政策的云南党并没有发生与马、王、李三处的同样错误，而且一经上级推动，即在民主来潮时起了模范的作用，可见不是“三勤”政策不对，而是执行错了。

问题四，责任谁属。执行错了的责任谁负？首先应归咎于领导者。我在倡导“三勤”政策时，并未象现在说得如此透彻，故在传达上自然会有偏差，这是一。当时情况，重点放在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上头，自然在这方面说得多点，于是在比重上起了暗示作用，这是二。当时虽有新华^①

^① 即新华日报。

“团结”栏解释这类文章，但许多隐藏的同志看不到，没有想别的办法来补救，这是三。等到一九四四年民主来潮的前夜，没能有预见地告诉各地党，在形势变动时改变以前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这是四。第五点，南方局后来领导的同志自然也负一部分责任。在执行上的本身错误，如勤业，连本身职业化都未做到；勤学，连报纸都不看，更说不上政治提高；交朋友，与群众毫无联系。这些，自然应由这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自己负责了。

问题五，有无成绩。执行“三勤”政策有成绩的地方，如办事处各组 and 云南党不去说它，就连执行不力或执行偏于消极、保守的地方，只要它没有损失党的力量还能保存到民主来潮时用上，也还是它的成绩之一。只有既执行错了，等到来潮时又已一无所有，而且还又反对别人积极参加新的斗争，那自然应该加以清算了。

问题六，这种“三勤”政策，在蒋管区另一时期，另一地区，只要遇到相同的形势而主观力量又曾暴露得很多的地方，仍然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不过现在蒋管区，政治形势已经是革命来潮前夜，主观力量又已隐蔽多年，故一般地应采两面斗争策略，而组织形式也应采取一方面既能分散隐蔽，另一方面又能集中领导，并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形势，这就要如城工部原草案所说，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各个负责，互不打通。

附：

“三勤”政策是党在国统区 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

吴瑞章 黎 勤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贯彻党在国统区的隐蔽精干政策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政策，使大后方的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得以巩固，党员得以埋藏在群众之中，团结群众，积蓄力量，到一九四四年形势好转时，能够迅速有力地投入斗争。

对于“三勤”政策，近年来在党史界和一些革命回忆录中有所涉及，不过说法不一。例如，有的地方文史资料说，“三勤”政策是昆明西南联大的某些地下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精神，对学生工作提出的方针和口号。有的又说，“三勤”政策是一九四七年中共上海分局提出并报中央、而后传到全国的。本文仅就有关“三勤”政策提出和执行的情况，作一些介绍。

一、“三勤”政策形成的过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努力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蒋介石被迫作了一些政策上的转变。九月，国民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建立。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反共的。即使在抗战初国共合作的最好时期，也未放弃企图消灭共产党的祸心。抗战开始时，蒋介石在同周恩来的几次会谈和会晤中，就提出过对各党派“唯愿溶成一体”、“中共最好与国民党合成一个组织”、“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等主张，当即遭到周恩来的拒绝。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将它的政策重心由抗日转向反共。政治上肆意诽谤、中伤共产党，军事上不断制造磨擦进攻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加迫害。

时局的急剧变化，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斗争方式也必须有所变化。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党中央逐步确定了隐蔽精干政策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一九三九年中央关于对待国民党防共的一份文件中就提出：“今天华中工作的一般方针，是要多注意掩蔽力量，积蓄力量，埋头苦干，以待战

争情况之变化。”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在给湖南的工作指示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这个方针也被称作“隐蔽政策与精干政策”。为了执行这一方针政策，中央还相应地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例如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一年，党中央曾几次就共产党员被迫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出指示，说明国民党强化“限共、反共”活动，在大后方党政军机关及学校工厂甚至农村，强迫群众表明反共态度，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扩大自己的力量，加强其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则想通过各种特务方法暴露和打击共产党员，以达到削弱、孤立与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同时指出，为了不致暴露政治面目，保持大后方党员的社会职业与合法地位，地下党员如果遇到强迫受训，强迫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时，不要拒绝与拖延，应和一般社会人士一样去受训、填表，但必须向党组织报告。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以坚定他们的立场。指示还对国民党强迫我党党员进行特务活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付办法。显然，这样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都是为了使党员和党组织能够更好地埋伏隐蔽下来，以便积蓄力量，等待高潮到来时带动群众投入斗争。

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工作作了认真周密的布置；对党员和干部按照不同情况，加以分散、隐蔽、转移或撤退；对党在国统区的公开机构，按短小精干的原则加以调整。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二月三日写给书记处的关于疏散干部的信中讲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百五十多人拟

疏散至六十人，新华日报二百一十六人拟疏散至最小限度四、五十人。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坚决地、勇敢地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坚决地、勇敢地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改变联系方式，强调党员独立活动，党员转移时暂时不转党的关系等等。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二日，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和研究了国统区党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中央去年确定了组织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是很正确的，但这种政治路线是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才能完成。我们的组织方针是继续发展，所以对过去的经验也要加以检讨。他还说，国民党的政策日益走向法西斯化，即特务化，它的组织政策是实行党化全国的路线。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针锋相对。我们要撤退已暴露的干部，提拔新干部，这是保存力量的重要措施。但光是这些还是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国民党日益法西斯化这个特点，不及时改变我们的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干部和党员还会继续暴露，党的组织还不能巩固，甚至还不能立足。他指出，要改变公式主义的思想和工作方式。那种认为不联系就不能为党工作的思想是不对的。党员要在社会生根、交朋友、学习——巧妙地实施党的政策来为党工作。在社会生根也就是巩固自己的职业，多交朋友，学会认识社会，鉴别各种人；学习、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十二月上旬，南方局进一步确定，大后方一般党员与干部“以巩固社会地位，加紧个人学习，广泛结交

朋友为中心业务”。这样，“三勤”政策的基本思想就逐步提出来了。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在毛泽东就整风学习等问题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明确地说，大后方党支部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七月份，在《中央关于取消秘密党的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中，再次指出：“支部每个党员的任务就是勤学、勤业、交朋友。”后来，这三项又被称作勤业、勤学、勤交友，简称“三勤”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转战陕北时曾对廖志高、于江震、杨超三位同志就“三勤”政策比较系统地谈过一次话。他说：三勤是在皖南事变后，蒋管区由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民主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

二、“三勤”政策是一项 积极的有效的政策

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处于低潮时期，党的地下组织，由于认真地贯彻了“三勤”政策，不仅组织得到了巩固，而且取得了许多成绩。

首先，实行“三勤”政策有效地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破坏共产党组织，搞垮进步力量的阴谋。

很明显，在国民党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对其统治区人民实行高压政策，企图搞垮我党的一切地下组织的时候，如果不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仍然强调不停顿地进攻，

那就是十足的盲动主义，完全中了国民党的诡计。

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执行“三勤”政策，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当时，相当一部分党员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日高潮、国共合作最好时期发展的，他们比较习惯于公开的、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工作，不习惯、不会或者不愿意埋头做秘密工作。转入地下隐蔽起来，要在没有组织联系和直接领导下独立工作，一时很难适应。因而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和出现了一些错误作法。如有的不肯正视现实，不愿在艰难环境中埋头苦干、联系群众，而将自己囿于小圈子中，思想上感到空虚、苦恼；有的仍想采用过去的工作方式，想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在一份经周恩来仔细批阅过的南方局青年组一九四二年工作总结中，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它说，在重庆、成都、贵阳有五十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发起组织“全国读书会”，以重庆读书会为核心，各地青年朋友为对象，组织分会或小组，以不定期的油印秘密刊物《火与刀》作联系工具。工作任务是“除巩固已有的小组外，广交青年朋友，改进他们的意识，使之热爱中国共产党，并以它的主义作为自己唯一的信仰，尽量设法帮助因失业而贫困的青年。”显然这样做是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经过南方局青年组多方工作，说服开导，讲明在当时的条件下，组织秘密团体，尤其是全国性的团体，不仅事实上行不通，而且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只有认真贯彻“三勤”政策，以交朋友的方式去团结青年，才能帮助一部分青年朋友进步，推动抗战事业的进展，“这就是自己责任最好的完成”。重庆读书会的负责人接受了青年组同志

的意见，取消了读书会和秘密刊物，改变了工作作风和方法，这不仅保存了力量，而且形成了重庆市南岸、城内、磁器口三个区职业青年的据点。与此相反，贵阳分会不肯接受意见，不久就被破坏，三十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受到牵连。

第二，贯彻执行“三勤”政策的另一个效果就是巩固了党员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使党员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和“三勤”同时提出的还有一个“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和群众化(或合法化)。“三勤”和“三化”精神是一致的。这就要求党员改变过去那种没有职业到处跑街的工作方式。党员不仅要有职业，和群众一样生活、工作，而且还要勤于业勤于学，要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好，当会计的要管好帐，当学生的要念好书。这样就不仅使党员在社会上站稳脚，在群众中扎下根来，而且还学会了一些生产和生活的本领。《新华日报》在宣传“三勤”政策，引导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如何搞好工作和学习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青年生活》和《团结》两个栏目中，用指导青年学习、工作和生活形式，有针对性地介绍如何巩固职业，精通技术业务，刻苦学习，广交朋友等等。例如《谈青年应有的品质和作风》就比较具体地阐明了“三勤”政策的内容和要求，说明青年“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尽管今天的学校管理和教育方针有不敢苟同的方面，可是学校有着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科学成果，“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学习”。对职业青年，“主要任务是精通本部门的工作和技能”，

“不管工作的大小都要按步就班地去做，替自己造就出特长和技能”。在交朋友方面，文章说，“要融合到同学和同事中去”，以“合群、友谊、互助、互学”代替孤独和小圈子。“道义之爱的朋友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是有价值的助力。”还有一些文章如《谈职业青年的学习》、《谈青年的路》、《一种青年人的危机》等，都是针对职业青年和学生的思想，阐明站稳岗位，切实努力，精通业务，把根深深扎在社会土壤之中的重要意义。事实证明，由于执行了“三勤”政策，党员在复杂的环境中就站稳了脚跟，学到了知识和技术，增强了本领。

执行“三勤”政策，还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每个党员必须对自己所在的单位或部门进行调查了解，弄清这个单位或部门有什么政治背景？人员的组成情况怎样？有哪些党派团体？领导成员的政治面目和政治态度怎样？周围人的思想状况和兴趣爱好是什么？群众的困难和要求是什么？通过调查，一方面可以向中央和南方局提供情况，便于上级决定政策；另一方面，也使党员学会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学会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的工作方法。这就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战斗力。

第三，执行“三勤”政策为一九四四年以后群众运动重新活跃准备了条件。一九四四年国际国内形势起了重要变化。国际上，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败局已定，日益走下坡路。在国内，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和黑暗，更激起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愤慨和不满。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也鼓舞了国统区的人民群众。

因此，一九四四年，国统区的群众运动又逐渐恢复起来。国际、国内的形势虽然是群众运动勃兴的有利条件，但如果没有扎根于群众之中的党的组织的领导，新的群众运动的高潮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以周恩来肯定和表扬过的云南为例，皖南事变后的几年中，云南省工委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三勤”政策，隐蔽下来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在校读书的绝大多数学习成绩是好的；有社会职业的，也做好自己的工作，因而得到了周围群众的信任。交朋友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以分散的、小型的、生活的各种形式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些积蓄起来的力量成为以后爆发波澜壮阔的一二一运动的重要基础。

总之，通过贯彻“三勤”政策，认真落实了党中央的方针，扎扎实实地积蓄了力量，有准备地迎接了一九四四年以后的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三、“三勤”政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原则的继续和发展

党员职业化是二战时期地下党秘密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原则是在同国民党白色恐怖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周恩来在白区工作中一贯倡导和坚持这一原则。他在一九三一年年底进入中央苏区以前，在上海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时，在他起草或参与起草的中央给各省关于白区工作的指示信中，都不断强